青少年慈善需求状况调研报告

——基于北京市的问卷调查

□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课题组

摘　要：为深入了解北京市青少年的慈善需求状况，本研究选取了五个青少年群体分别进行了调研，即家庭困难大学生、北京籍家庭困难青年、北京籍家庭困难中小学生、新生代农民工和流动少年儿童。在问卷调研的基础上，分别分析了这五个青少年群体的慈善需求状况，剖析了青少年慈善需求的新特征和新趋势，最后对青少年慈善供给提供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北京市；青少年；慈善需求

为全面了解北京市青少年的慈善需求状况，剖析青少年慈善需求的新特征，预见青少年慈善需求的新趋势，为青少年慈善公益工作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撑，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与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开展了“北京市青少年慈善需求状况”课题研究，调研情况如下。

一、调研的基本情况

1. 调研背景

需求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原动力、出发点和归宿。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下，当代青少年成长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青少年的需求更加广泛、具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找准青少年需求的关键点，才能为青少年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才能使有限的服务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才能真正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在青少年的需求中，慈善需求是青少年需求的重要组成。从广义上说，青少年慈善需求涵盖青少年所需要的物质、情感、技能、发展等各个层面。面对青少年多样化的慈善需求，如何通过专业的公益慈善方式来满足广大青少年的需求，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青少年公益组织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2. 调研对象及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指在北京市辖区范围内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青少年。根据北京统计信息网汇总数据，截至 2013 年，北京市 5–34 岁的青少年常住人口总数达到 970 万人[1]，其中 5–34 岁户籍人口 449 万人[2]。总体而言，首都青少年人口基数较大，分布区域广泛。为提高本课题研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本课题选取了家庭困难大学生、家庭困难青年、家庭困难中小学生、新生代农民工和流动少年儿童五类重点群体开展调研。这五类群体既涵盖了北京市青少年群体的主要类别，又是最需要慈善帮助的重点群体。同时，本课题把青少年的年龄限定在 6–35 岁之间，并分为 6–17 岁和 18–35 岁两个年龄段开展研究。

2013 年北京市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 9.1 万人，在学研究生 26.6 万人，毕业生 7.3 万人。全市普通高等学校全年招收本专科学生 16.3 万人，在校生 58.9 万人，毕业生 14.9 万人[3]。北京市大学生总数达 85 万人以上，按 5% 的比例进行粗略估算，特困生约有 4 万人左右。针对家庭困难大学生群体，按照国家重点大学和国家非重点大学的区分，我们选取 10 所部属和市属高校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国家重点大学 7 所，非国家重点大学 3 所。在非国家重点大学中，2 所为

普通本科学校，1 所为大专学校，涵盖了文科、理工、综合等类型大学。共发放调查问卷 27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62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8.9%。

北京市民政局公布，自 2013 年 1 月 1 号起，北京市城市低保标准为家庭人均 580 元 / 月，农村低保最低标准为家庭人均 460 元 / 月。如果将低保标准定为特困标准，则北京市籍 35 周岁以下的特困青少年共有 4.9 万人，其中城市有 3.1 万人，农村有 1.3 万人；0–18 岁的有 2.4 万人，19–35 岁的有 2 万人；特困中小学生有 2.1 万人，特困非在校学生约有 2 万人[4]。针对北京市籍家庭困难青年（非在校）群体，共发放调查问卷 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9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9.5%。针对北京市籍家庭困难中小学生群体，我们根据北京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功能定位差异，对七个城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1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28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1.9%。

北京团市委在 2012 年底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发展与服务》调查报告显示，截止 2012 年底，北京市 16–35 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约 220 万人，占全市 5–35 岁青少年总数的 23%，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5]。根据《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 0–14 岁的流动儿童将近 50 万[6]。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主要调查了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年龄在 16 岁以上，在北京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外地农业户籍人口。调查数据来源于北京团市委委托北京市青英研究中心 2012 年开展的调查。2012 年 5 月 –8 月，北京市青英研究中心通过问卷调查了 2000 家单位，共发放问卷 8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725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0.7%。

针对流动少年儿童群体，主要调查了北京市外来人口中 18 周岁及以下的儿童和少年人口，以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为主。共发放调查问卷 1500 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为 143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8%。

二、调研的主要发现

1. 贫困大学生的慈善需求

（1）经济压力大，渴望在社会帮助下“自食其力”

调查发现，北京市贫困大学生的经济压力大，消费水平较低，每个月的花销集中在 401–1000 元之间。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依然靠父母提供。消费结构单一，伙食等基本生活消费是每月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占到 77.0%，电脑等耐用品的拥有率较低且价位偏低，其他消费尤其是娱乐享受型消费的比例很低。较低的经济收入使贫困生普遍感到生活和学习上的消费压力。为此，60.5% 的贫困生打过工，他们首选“家庭教师”（41.9%），其次为“促销”（21.8%）和“快餐厅钟点工”（16.7%）。勤工俭学的目的主要是“增加收入”（32.4%）、“锻炼自己的能力”（29.9%）和“想自食其力”（24.3%）。

（2）渴望拓宽人际交往范围

调查发现，北京市贫困大学生渴望有更多的人际交往。当问到“是否主动扩大人际圈”时，58.7% 的贫困生表示自己“有想法也有行动”，“想过但没付诸行动”的占 32.0%。当遇到困难时，30.0% 的贫困生会找父母，其次是“室友”（19.0%）、“辅导员”（15.2%）、“自己解决”（14.5%）。

（3）就业竞争压力巨大

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家庭经济实力的薄弱、家庭社会背景的欠缺，使得一些贫困大学生双向选择的竞争实力不强，不能正确对待面试挫折，对就业产生困惑、失望、逃避的心理冲突，容易丧失就业机会。在今后的就业设想方面，41.7% 的贫困生表示“会选择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19.8%“想自己创业”，18.8%“想继续深造”，16.1%“今后看情况再说”，3.5% 表示“没考虑过”。

（4）承受多重心理压力

贫困大学生群体的身心反应症状较非贫困生群体明显，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较非贫困生低，尤其在强迫症状、人际敏感和抑郁方面更为突出。部分贫困生背负着经济、心理上的双重压力，不仅严重影响了他们正常学习、生活，而且影响了他们健全人格的形成。30.2% 的贫困生认为他们面临的最大挫折是“学习成绩不理想”，其次是“缺乏自信心”（22.6%）、“就业竞争太激烈”（16.5%）、“人际关系不和谐”（15.7%）和“经济困难”（7.6%）。他们应对心理压力的方式，45.0% 选择“听音乐”，20.2% 会选择“吃东西”，11.1%“写日记”，7.2%“找朋友聊天”。

2. 家庭困难青年的慈善需求

北京市困难家庭青年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家庭收入低。58.7% 的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5000 元以下。二是父母以务农为主，务农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三是处于经济相对贫困地区。家庭处于相对贫困地区（47.1%）是导致家庭困难的最重要原因，远远高于疾病困扰（13.5%）和子女抚养（11.2%）。四是生存型支出占主要比例。

伙食（61.4%）、医疗（53.1%）和住房（50.9%）是他们最大的三项家庭开支，而休闲娱乐（18.0%）和旅游（17.8%）的开支最少。

（1）个人成长环境较差、业余生活单调

家庭贫困严重影响了青年的个人成长，主要表现在：一是业余生活相对单调和封闭。调查显示，每天除工作外，他们的业余时间主要用来“看电视或玩电脑”（60.2%），其次是“照料家人”（54.5%）和“与朋友聚会”（48.5%）。此外，还有 29.8% 的被调查者表示业余时间“发呆，什么都不做”。二是住房条件有限。一半以上（54.1%）的被调查者“和父母同住”，仅有四分之一（26.5%）表示自己拥有住房。他们当前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是“居住面积太小”（63.0%）。

（2）受教育程度较低，进而导致事业发展受挫

在事业发展方面，收入低和学历低是困扰他们的主要因素。一是收入较低。69.4% 的被调查者收入在 3000 元以下，其中，33.6% 收入在 2000–3000 元之间。二是学历低（51.0%），这是影响他们就业难的最主要因素。仅有三分之一（36.7%）的被调查者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他们最希望得到提升的是“学习一门技术”（47.4%）、提高“工作能力”（47.1%）和“沟通能力”（44.6%）。

（3）社会参与水平亟待提高

北京市家庭困难青年的社会参与水平较低。他们参加单位集体活动积极性不高，对单位举办的活动没兴趣。58.8% 的被调查者表示偶尔参加或不参加单位集体活动。他们不参加单位集体活动的原因在于“对举办的活动没兴趣”（45.5%）和“性格比较偏安静些，不知道聊什么好”（30.1%）。他们更喜欢参加“朋友聚会”（57.5%）、“同事聚会”（40.8%）和“同学聚会”（39.6%）。

3. 家庭困难中小学生的慈善需求

（1）对学习辅导有着强烈的需求

调查发现，学生最希望提升的三个项目是：“提高学习成绩”（31.3%）、“身体健康”（14.9%）和“学习一门特长”（11.2%）。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最大的需求是提高学习成绩。而在学习困难上，“学习方法不合理”占 27.2%，“得不到有效的学习辅导”占 21.5%，“学习时间不充足”占 21.4%，“因为经济困难而购买不起学习辅导资料”的占 12.6%。可见，他们主要的需求是加强学习辅导，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2）网络交往模式影响了家庭困难中小学生的社会化程度

进入中学阶段，青少年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同辈群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交往需求，倾诉对象排在第一位的是同学。但当下，网络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越来越大。家庭困难中小学生到了高中阶段更倾向于虚拟的网络交往模式以及个体化的网络娱乐方式，这不利于他们的社会交往，会影响其社会参与以及社会化程度。

（3）家庭困难中小学生需要家长的心理关怀

他们需要来自父母的关怀，家长对于他们的理解程度影响了他们的心理状况。不过，不同年龄段对父母的关怀需求不一样。小学阶段更需要父母对他们学业上的关注，经常辅导他们的功课。进入青春期后，青少年的叛逆心理越来越强。学生对于父母辅导功课的要求少了，他们更需要父母对他们的理解和包容。而到了高中阶段，学生进一步成熟，他们更希望能和父母进行沟通和交流。

4. 新生代农民工的慈善需求

（1）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水平较低

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北京务工期间，认为经常遇到不公正待遇的占 6.3%，认为从来没有遇到过不公正待遇的占 24.5%，其他 69.2% 的人都或多或少有过不公正的待遇。认为政府管理部门人员对待外地人不公平现象很普遍的占 15.6%。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北京面临着较强的歧视和排斥。新生代农民工中有 24.8% 没有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签订 1–3 年合同的占 57.6%，3 年以上合同的占 9.3%。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21.5% 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单位没有给他们缴纳任何保险，其中缴纳养老保险占 50.4%、医疗保险占 57.7%、工伤保险占 52.1%，失业保险占 35.9%，生育保险 26.3%。

（2）希望接受实用性强的职业培训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更希望通过技术来改变命运，他们希望在业余时间接受教育培训，提升自我。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占 59.8%，其中 79.1% 都是由单位组织的，自费参加职业培训的有 19.9%。但是目前的职业培训手段忽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心理和学习的特点，主要采取“填鸭式”教学方式，难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同时，由于缺乏实践性教学，缺少实践基地，从而大大降低了教育培训的实效性。

（3）社会融入需求强烈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对融入城市、公平享受公共服务的期望越来越高。调查显示，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中，有 92.5% 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北京人。而他们认为自己不

是北京人的原因，一是没有北京户口，占 59.1%；二是在北京没有房子，占 52.7%；三是没有获得市民待遇，占 30.9%。在他们看来，是户口和住房将他们排斥在北京这座城市之外。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模糊，占 39.1% 的人表示不清楚自己该用何种称呼，认同将自己称呼为流动青年的占 11.4%，新居民占 10.6%，打工者占 10.5%。流动青年、新居民或者打工者的称呼，都表明他们更强调自己的外来性、流动性。同事（28.8%）和老乡（25.3%）是他们在北京最主要的社会支持网络。

（4）希望拥有个性化、丰富性的精神文化生活

与父辈们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再把挣钱谋生当作“打工”的第一目标，而是希望能够在城市谋求发展。他们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更主动的文化融入愿望，更迫切的文化需求。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时间选择上网的有 50.9%，看电视的有 47.8%，睡觉占 40.8%，逛街占 37.4%。上网是他们闲暇时最主要的活动。他们上网经常进行以下活动，一是上 QQ/MSN，二是查询资料，三是看视频听音乐。新媒体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娱乐和生活方式，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他们的日常生活更深地嵌入进网络虚拟世界中去。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必然对个性化、交互性、丰富性等提出更高的要求。

5. 流动少年儿童的慈善需求

（1）流动少年儿童没有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

受教育是流动儿童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需求。近年来，关于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们可以在北京参加中职与高职入学考试，并且学费全免，但仍然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和高考。调查发现，流动少年儿童处于一个不安定的环境之中，他们普遍对未来感到很迷茫，没有具体清晰的奋斗目标，纠结于是回老家参加高考还是在北京参加中职考试。而且流动儿童的家庭化迁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许多流动儿童从小就出生在北京，面临着学前教育问题。流动少年儿童的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需求将凸显出来。近年来，由于北京适龄儿童的激增，北京及北京周边地区（如燕郊）流动儿童入学面临的问题进一步加剧和复杂化。

（2）低年级流动儿童对学习辅导有着强烈的需求

调查发现，流动少年儿童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学习成绩差，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学习辅导使学习成绩变得优异。不同年级之间尤其是小学生和初中生之间对于学习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大部分三至五年级学生都持有“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的态度。而到了八年级、九年级这个比例已经很低了，这个阶段的流动少年儿童的人生目标已经不是考大学，而是以实用为目标。

（3）流动少年儿童是城市的边缘群体，社会融入难

在社会融入方面，流动少年儿童面临的一个心理障碍是胆小、不自信。总体来说，公立学校的流动少年儿童比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融入度更高。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全是流动少年儿童，他们聚居于主要由外来务工人员所构成的城中村，基本与北京的少年儿童和北京户籍人口处于隔绝状态。公立学校的学生参与班级集体活动的积极性更高，经常参加的比例占 66.3%。可见，公立学校的流动少年儿童对社会融入的积极性更高。但也不容乐观，在我们调查的这几所公立学校，打工子弟生源都占学校生源总数的 70% 以上，一些学校甚至达到了 90% 以上。

（4）流动少年儿童家庭缺乏亲子交流

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主要从事的是服务业、建筑业、装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的流动性强、工作时间长、以家庭共同经营模式即夫妻店为主。这就意味着流动少年儿童的家长往往忙于经营而无暇顾及他们。还有一些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很低，对于他们来说学校最主要的任务是保证孩子的“安全”，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低成本组织机构。但教育不仅仅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缺乏亲子交流会影响流动少年儿童的人格成长与心理健全。

三、青少年慈善需求的对策建议

1. 贫困大学生慈善需求的对策建议

（1）整合社会力量，合力推进贫困生资助工作

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证明，贫困大学生资助仅仅靠政府和学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广泛争取社会力量的参与。要充分动员社会各界参与贫困大学生资助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构建起多方参与的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当前，我国虽然已有不少的社会力量参与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工作，但从总体上来看，数量和影响都极其有限。这就需要通过大众传媒的宣传，引导和鼓励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工作。

（2）尊重贫困生的主体地位，构建发展性资助体系

在贫困生群体中培养造就一批优秀拔尖人才是高

校贫困生慈善所要实现的最高层次，也是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创设以能力发展为导向的资助项目，并有意识引导需要受助的大学生结合所修专业去申报。在资助的过程中，要确立贫困生的主体地位，培养他们的主体能力。通过活动实践，帮助贫困生获得与一般学生相同的发展条件，建立起帮助贫困生成长为优秀拔尖人才的教育支持长效机制。

（3）高校资助应平衡发展，关注民办高校和大中专院校贫困生慈善救助

目前，高校助学工作的发展不平衡。对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的贫困生的资助相对较多，而对普通高校贫困生的资助较少，尤其对于农、林、地、矿等高校和基础专业的贫困生少有问津。一般院校特别是地方院校，由于名气不大，社会力量既不愿意向其提供奖、助学金，也不愿意向其提供勤工助学岗位，而这些高校所招收的学生又大多来自农村，贫困生比例高。这种有所偏好的资助，反而会加剧社会不公平。

（4）促进贫困生工作的专业化

贫困生资助工作要坚持以贫困生为中心，尊重他们的基本需要和个体差异，既给予贫困生经济上的扶持，也要关注他们的精神需要，最大限度地为他们的成长成才创造条件。目前，高校的贫困生资助体系的专业化水平还比较低，贫困生的评审过程往往要将某些隐私公布于众，一些社会机构的捐赠往往对他们过度曝光，这都加重了他们的精神负担。因此，要强调建立以贫困生为中心的资助方式和工作理念。

2. 家庭困难青年慈善需求的对策建议

（1）着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辅导，提升贫困家庭青年的人力资本

由于青年的特殊性，对青年尤其是青年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展，其社会效用会更大，社会影响力也会更为有效和深远。所以，应该加强对家庭困难青年的人力资本提升。在项目支持上，联合相关政府机构开展青年就业创业辅导和职业技能培训，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在就业中具有技术优势。要对特别困难的青年进行单独支援服务，开展辅导或实习，协助他们脱离贫困。

（2）加强和社会组织的合作，让社会组织成为工作延伸的手臂

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迅猛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绝大部分社会组织都会或多或少地参与慈善和公益事业，都会和青少年发展有关联。加强和社会组织的联系合作，让其成为自身工作延伸的手臂。比如，要加强和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发挥城市社区在青少年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动员社区社会组织为青少年提供服务。

3. 家庭困难中小学生慈善需求的对策建议

（1）加大对家庭困难中小学生学习需求的支持

青少年对物质层次的需求落后于发展的需求，尤其是在学生群体中，“物质的需要”——即追求良好的物质待遇，希望自己的生活条件好，处于第二位。“学习成绩”这一较高层次的需求放在首位。可赠送家庭经济困难中小学生课外图书，或联系青少年宫、各高校图书馆、部分辅导机构、社区等开展适当的学业辅导服务。

（2）加大对家庭困难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支持

中小学生的动机系统、情绪倾向、行为习惯、认识能力、人格特征、自我意识和早期经验等心理活动的内部机制，都影响着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学习的压力、对生活学习环境的不适应、同学间的人际关系问题及各种挫折问题不断困扰着中小学生。与学校合作构建中小学心理危机监护机制，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多种集体活动关心家庭经济困难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3）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中小学生家庭的救助

困难家庭存在一个可怕的难以逆转的“贫困陷阱”，即家庭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和身患疾病导致劳动人口的就业困难，就业困难使贫穷进一步加剧。贫困家庭面临的这种窘境表明，在社会救助方面，最低生活保障仅仅是一个最低层次的保障，要从根本上使贫困家庭摆脱贫困，必须为他们在医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提供基本保障和救助。治本的基本理念是为贫困家庭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主要措施是扶持他们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包括成年人的再教育、再培训机会和子女的上学机会）。

4. 新生代农民工慈善需求的对策建议

（1）转变慈善观念，引导慈善机构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慈善供给对象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出现并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群体，相比较其他城市群体而言，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更需要得到关注和帮助。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慈善供给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传统慈善观念的制约。慈善机构包括整个社会并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慈善供给的对象，故引导社会转

变慈善观念，引导慈善组织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慈善供给体系将是我国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慈善供给的工作重点。

（2）动员多种社会力量参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慈善供给

新生代农民工慈善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其慈善供给主体的多样性，故需要动员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慈善供给中去，这些社会力量既包括慈善机构，也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其他社会主体。在多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下，最终在社会层面形成对新生代农民工慈善需求的共同关注与共同供给。

（3）积极培育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慈善组织

积极培育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慈善组织，即积极鼓励、培育和扶植相关社会力量建立健全一个专门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的慈善组织机构，加强对这些社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以此畅通和完善相关社会力量参与新生代农民工慈善供给的社会渠道。建立起一个系统的新生代农民工慈善供给机制，真正发挥“第三只手”在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慈善需求方面的作用，有效维护社会公平，真正实现全社会共享改革开放的果实。

（4）满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层次的慈善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的慈善需求是有层次的，包括基础性慈善需求、特殊性权益慈善需求和发展性慈善需求，这就要求在对该群体进行慈善供给时必须在明确目标和任务的前提下有重点、分层次地有序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慈善供给的目标和任务是满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层次的慈善需求，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更好地生存和生活，以社会的第三次分配来进一步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

5. 流动少年儿童慈善需求的对策建议

（1）对流动少年儿童群体进行细分，根据不同的群体设计不同的项目

对流动少年儿童群体进行细致分类，并设计多个单独又纵向衔接、横向互补的项目。既可以在纵向上对不同年级组合进行分类，又可以在横向上根据流动少年儿童的未来打算进行分类。譬如，打算回老家读书的为一个群体，打算在北京读职高的为一个群体。

（2）重视对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资助

流动少年儿童很大一部分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最突出的问题是师资力量不足，学校的教学无法保证。而且老师不享受最基本的保障，寒暑假没有工资，工作不踏实，队伍不稳定。目前的资助主要集中在学校的硬件设施方面，但是光有设备，没有好的老师，也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应该加强对教师的基本保障，包括五险一金及寒暑假工资，吸引教师到打工子弟学校任教。

（3）加强对流动少年儿童的能力培养

对流动儿童的帮扶不能停留在物质层面，而应该关注他们的未来发展，加强对他们的能力培养。流动儿童下课后，有大段的自由时间，但他们往往没有自控能力,沉迷于网络之中。而家长也忙于生意和工作，无暇顾及他们。与此同时，流动少年儿童普遍对未来感到迷茫，对自己的未来职业没有规划，也不知道该如何规划。应该帮助流动少年儿童提高他们的自律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6. 总体建议

（1）转变资助理念，“物质”和“精神”并重

传统的资助模式重“物质”轻“精神”，重“他救”轻“自救”，虽然有效地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但对青少年长远发展所需能力与素质的帮助不明显[7]。贫困青少年由于家庭困难，在面临经济压力的同时，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心理压力。在对贫困青少年进行经济救助时，应当高度关注他们的特殊社会心理需要和精神生活发展需要，坚持“物质”与“精神”并重的理念。慈善资助应从“捐血式”转型为“造血式”；从“补偿式”转型为“发展式”，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注重“源头资助”，加强对青少年家庭的帮扶

贫困具有代际传递的特点，要减少贫困青少年的数量，缓解贫困青少年的经济困难，改变贫困青少年家庭的经济状况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家庭是青年成长发展的基本载体,也是满足青年需求的主要经济来源。要注重“源头资助”，发挥家庭的造血功能，加大对青少年所在困难家庭的帮扶。在政府提供的健康、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积极性社会福利政策外，慈善公益组织要以满足青少年的需求为核心，开展对青少年所在家庭的帮扶。要发展对困难家庭青少年的经济补助或福利服务，积极满足他们的需求，巩固家庭的功能，协助贫困家庭青少年通过共同努力来摆脱贫穷，从源头上改变困难家庭青少年的贫困状态。

（3）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开展个性化、专业化的资助项目

新形势下，青少年的需求日益多元化，不同群体、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需要的资助更加多样化。目前，公益组织以物质捐赠和经济资助为主，缺少具体的、针对性强的项目运作模式。这种单一而又缺乏针对性的资助方式很难解决青少年的实际问题，并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物质捐助和经济资助具有它的局限性，无法解决思想穷、眼光穷等问题。因此，要适应青年群体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提供个性化、针对性强的资助项目，从而尽可能满足青少年的多样化需求。

（4）整合社会力量，建立多方共同参与的慈善供给系统

青少年正处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阶段，对于他们的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其社会效用会更大，对于从根源上消除贫困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因此，在当今全球经济竞争中，投资儿童的边际效益最高，相关项目的启动越早越好。而且青少年的慈善需求具有多样性。这就不仅需要政府加大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还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构建青少年慈善需求的多方供给体系。■

课题组撰稿人：
刘俊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研究员
王鹏：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
汪永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
程旭辉：中国青少年研究会期刊部主管

责任编辑 / 汪永涛

参考文献：

[1] 根据 2013 年人口抽样调查推算数据，为年末数。
[2] 数据来源：北京市公安局。
[3]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 北京市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 北京日报，2014-02-13(04).
[4] 数据来源：北京市籍 35 周岁以下城乡贫困青少年基本底数据调研数据 . 北京市民政局。
[5] 16 至 35 岁新生代农民工约 220 万人 [EB/OL]. 北青网，http：//bjyouth.ynet.com/3.1/1212/24/7703823.html.
[6]侯亚非，尹德挺 . 首都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与服务管理创新[D]. 载于首都社会管理发展报告(2013).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
[7] 李贵平 . 高校贫困生资助的发展性对策 [J]. 教育评论，2012 (4).

（上接第 16 页）

渠道与方式。

4. 媒体参与是慈善供给的重要推动力

媒体对公益事业和公益项目透明度问题的持续关注，推动了一系列法规和自律守则的出台，成为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推动者和监督者。媒体和媒体从业者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潇湘晨报创立了国内首个由平面媒体发起的公益基金会，媒体人邓飞等人发起的“免费午餐”项目更是推动了政府政策的出台，创立了民间与政府互动的新模式。媒体已成为我国慈善行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刘俊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 汪永涛

参考文献：

[1] 民政部发布 2012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EB/OL]. 中国社会组织网，http：//www.chinanpo.gov.cn/2201/66026/yjzlkindex.html.
[2] 候欣 . 关于北京成长向导服务发展的讨论 [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 (1).
[3]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http：//www.bjydf.cn.
[4]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http：//www.ccafc.org.cn/templates/Project/content.aspx?projectid=89.
[5] [7] 厉文斌 .“重生行动项目”中的社会工作介入 [D].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6]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2011 中国公益事业年度发展报告——走向现代慈善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